

在进入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被西方文化大面积覆盖的时候,对本土性的倡导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本土性是一种比现代性更重要、也更切时的文学品格。至少,本土性可以与现代性同时并存。它能够照亮被现代性遮蔽的许多地方,更切应中国新文学的历史环境和现实处境。

本土性：一种亟待关注的文学品格

□贺仲明

现代性质疑与本土性出发

至少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性就成为中国文学发展最基本的方向和准则。无论是在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中,现代性都是使用频率最高的理论术语,无论人们评价一个时期的文学成就,还是具体分析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都以是否符合现代性方向作为几乎惟一的尺度和标准。

但是,近年来,文学界表现出对现代性方向的批判性反思。这与西方后现代文学思潮的巨大影响有关,也是社会文化多方位检讨和深入认识现代性的结果。这些反思主要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其一,现代性是否适合作为文学评价的标准?文学不同于科学技术,也不同于一般文化意识形态,它的标准具有跨时代性甚至永恒性。古典文学的品质并不一定逊色于现代和当代文学,现代作品的艺术魅力也不一定能够达到前人水准。以“现代性”为惟一原则来评价文学,很可能会遮蔽文学创作的丰富和多元个性。在中国新文学历史中,旧体诗词和“通俗文学”就曾经被完全排斥在外。但近年来,人们对这种排斥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其二,现有的文学现代性标准背后是否有西方中心的价值理念存在?现代性标准完全是以现代西方文化为准绳建立的。这当然有其合理性,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文化理念和制度等方面,但是,这一理念是否绝对合理?是否一切文化发展都应该以西方为目标和模板?特别是思想和审美特性都非常崇尚个性和独特性的文学创作,一味以西方文学为准绳是否会影响文学创造品质的降低?

在这个背景下,文学本土性的价值逐渐被许多人所认识。如果说在冷战时期或者说在改革开放之前,提倡本土化是一种保守和封闭,那么,在进入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被西方文化大面积覆盖的时候,对本土性的倡导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本土性是一种比现代性更重要、也更切时的文学品格。至少,本土性可以与现代性同时并存。它能够照亮被现代性遮蔽的许多地方,更切应中国新文学的历史环境和现实处境。

何谓文学本土性？

本土性思想最基本的前提关系到对文学本质的基本认识。也就是说,它认为文学应该立足于本土社会和文化环境,其基本意义也在于此。一方面,只有立足于深邃而广袤的本土生活,文学才可能具有真正的创新意识和深度意识;另一方面,与之相应,文学的基本功能在于为本土社会服务,即使一个作家的创作完全局限于本土社会范围之内,不能为更广泛的大众所认识,但只要它能够为本土大众所认可,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它依然具有不可忽略的重

要意义。具体说,文学本土性应该包含以下内容:

其一,与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深刻关联。任何文学都与其独特的民族生活、文化有直接而深刻的联系,优秀的文学则是与它联系紧密,并借助它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视世界和叙述世界的方式。只有深深地植根于深邃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中,文学才能拥有自己的独特个性,并具备其独特价值。所以,与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刻关联是文学本土性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其二,对本土生活的深刻反映。在一般情况下,作家都是以本土生活为书写对象。但是否能够深入到生活之中,表达出生活中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处境,是对文学本土性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因为虽然同处全球化时代,有共同的人类命运担忧,但在更多情况下,由于历史、文化和现实多方面的差异,每个民族国家的人所感受到的现代焦虑、困境是不一样的。如中国人在现代化面前就会有更多的乡村生活方式眷恋和走出乡村的两难困境,即所谓“文化乡愁”和“现实”之间的迷茫。相比之下,如族别问题、宗教问题、性别问题等,又是另外许多国家的现代性困境之所在。所以,真正进入生活本质,把握生活深层次的复杂问题,是文学本土性的重要追求。

其三,为本土大众所接受,成为社会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一种文学来说,最基本的读者是本土大众,最基本的功能也是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因此,文学被本民族大众所接受,成为现实文化的一部分,进而影响社会文化的面貌和发展,是文学值得重视的目标。就作家个体来说,当然可能存在因创作风格等原因而导致其与大众接受之间的差异,所以不能简单以大众接受为评价标准,但是,为一个时期文学的整体则不可忽略大众接受,在启迪、批判与引导中促进社会文化向美向善发展。

其四,融汇外来文学(文化)的因素。本土化不是封闭、孤立的,需要开放性地学习外国文学和文化经验,予以交流和融合。但需要明确的是,外来文学和文化需要与本土生活和文化结合起来,融化为自身的一部分,否则就难以扎根深入。所以,在融汇外文学和文化的过程中,始终不能失去自我,应该保持自己的主体性位置。

本土性与中国新文学

就中国文学而言,从最基本层面说,走出古典时代,经历现代更新,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所以,不能简单以本土性代替现代性,但在当前中国文学中,也许更应该强调的是本土性。因为长期以来对现代性无批判的、片面而极端的强调,新文学已经被严重沾染上现代性问题的困境。对于当前文学来说,加强本土意识,强化自我主体性和本土性,是其发展的重要前提。

五四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前驱,它引进和学习西方文学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但真正有效而彻底的现代转型,需要在学理层面与中国传统文化关联、融合,以及将西方文化和文学观念进行真正的中国本土化,在批判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与西方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真正独特的个性——审视世界的方式、表达的方式,并形成独特的思想和审美特色。这些工作不能寄希望于五四一代作家完成,而是需要后来者的不断继承和开拓。

遗憾的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文学的发展主要朝着跟随西方文学的方向,却没有表现出独立的创造性,没有呈现出有个性的本土特征。特别是近年来,在“世界文学”的大潮流下,已经严重走向误区,西方文学成为占据绝对引导地位的范本和目标。对于绝大多数作家来说,最大的荣耀是受到西方文化的认可,是作品被翻译成英语等西方语言,至于作品在本民族大众中有无影响,以及有没有得到他们的认可,都无足轻重。与之相应的是在写作内容上。很少有作家真正深入书写现实生活,以真诚之心去关怀和关注大众,揭示社会的矛盾复杂,以及普通民众的希冀、痛苦和无奈。对于很多文学作品来说,所写的内容虽然是中国人和中国生活,但实际上写的是作家们的自我想象,是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中国社会。

这样的文学观念实际上是对“世界文学”有意无意的误解。因为越是在世界性的背景下,文学本土性的价值意义才更需要凸显:丰富的民族和文化个性,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个性,正是对同质和单一现代性的抵制,也是生活和文学多样性、丰富性的体现。

在这一前提,需要特别提倡文学的本土性,而以下两方面的落实也许是最重要的。其一,就是真正确立为民族大众写作的原则。作为一时期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反映大众生活,表达其希望和追求,揭示其苦痛和矛盾,是文学无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文学最基本的创作原则。如此,作家才可能以平等关爱的心态对待大众,以引领和促进的立场对待民族传统审美习惯,使文学生长于生活,又超越于生活。其二,以更冷静客观的立场对待传统文化,从以往对传统的简单否定转为继承与批判相统一,同时努力将西方文学的方法进行“中国化”,将其思想内涵融入中国的本土现实生活中,完成现代与本土的真正融合。

最后还需要明确的是,提倡文学本土性,并不是排斥现代性。在大的方向上,本土性与现代性并不对立,而是有强烈的一致性。只是本土性更强调自身的独立,更强调传统和多样性。此外,文学本土性的内涵主要局限在文学范围之内,思想文化层面的本土性问题更复杂,需要进一步考量和探索。

新世纪以来,“底层”一词逐渐浮出历史地表,关注底层生活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想潮流。观乎近年来之文坛,亦概莫能外,从“三农小说”到“打工文学”,大量的文艺作品以“底层”为喉舌发声,大有“为生民立命”的架势,这些作品汲汲于塑造民间社会原始的生存形态,裹挟着自身的道德预判介入到对现实的艺术描写中去。然而,面对“底层普泛化”的巨浪洪流,令人疑虑的是,底层文学本身却是个不甚明朗的概念,时至今日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等待系统的梳理与辨析:是谁站在底层的位置上观察与写作?他又凭什么能够代表底层群体?与底层相对,是否还存在着文学上的主流与庙堂?底层小说与问题小说的区别在哪里?如何丈量底层文学的边界?与其说这些问题构成了底层文学生态场的一二面相,给予研究者学理上的启发,毋宁说来自它们本身所释放的批判意识的焦灼提醒着我们警惕底层“暧昧”的危机,使我们重新审视底层文学的价值根基。

“暧昧”其一,底层文学的范围定义过于宽泛,并未显出自身作为文学的一个门类在本质规定性上存留的特殊意义。这一点,尤其从其写作者群体中可以见出。底层文学的创作者是一个体量庞大的队伍,其中不乏像徐则臣、张悦然、格非这样受过高等教育与专业写作训练的作家,譬如《如果大雪封门》《大乔小乔》等作品就深刻地涉及到底层“边缘化”的阵痛,并能够援引反思时代、历史等宏观命题。但是他们笔下的底层是知识分子想象中的底层,是观念化的底层,并不是从浑然天成的生活熔炉里淬炼打磨而来,尽管也有很高的“真实性”与艺术水准,却难免不落入幻想与臆测的窠臼。与此相对的是,像余秀华、郑小琼等真正有过底层生活经历的人也在书写底层,并由此获得了大批的拥趸者,但是先验地用“低学历写作者”“流水线诗人”“农民作家”等意识形态化的标签去注解他们的作品又不啻是以底层之名来肢解原本完整丰富的思想意蕴,而使其作品沦为一种凸显生存困境的泛道德说教。以上两种包含不同文化质素,体现不同身份意识的作品都可以被笼统地囊括在底层文学名下,由是看来,现今学界认同的底层文学就是以底层为描写对象的文学这一定义显然不够精细化,它忽视了文学经验世界内部的裂缝与褶皱,似有“大小一锅端”的嫌疑,基于此造成的暧昧犹疑将成为百口莫辩的罗生门。

“暧昧”其二,底层文学的主体内涵在很大程度上被抽空,底层走向渲染人性苦难的乌托邦祭,失去了“有为”的精神诉求。赘述近年来所谓的与底层相关的文学创作,大多是搭建好苦难的故事支架,然后单刀直入,开掘人性,直陈怨愤,抒发感情。这样干脆利落的方式无疑很好地纠正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纯文学”愈演愈烈、技术至上的偏执,文学又一次紧紧地拥抱现实,成为针砭时弊、关涉民生的利器。但是在无穷无尽的问题的铺陈中,在对民间苦难的哀悼祭奠之中,软弱的主体与坚硬的现实达成了妥协和解,“我”本应具有的直接历史、寻求救赎的主体态度在有意无意间被隐匿了。底层完全成为了情绪迸发的裂口,悲哀、执著、牺牲、坚毅等等能够唤醒民间生命原力的情感和品质从这里喷薄而出……在贾平凹等人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他们以高超的艺术表现力为我们还原了苦难化的底层图景,搏来了读者的同情之理解。在精致玲珑的故事背后,作者们刻意展示了底层社会伟大的生存力量,给人以强烈的刺激与冲动,同时亦完成了个人内心的宣泄,获得抚慰式的超越。但究其根本,底层文学创作却拘囿于表现“他者”的悲欢离合,难以引发持久的与阅读者“自我”有关的生命体验,产生灵魂上的震颤与共鸣。这是因为底层文学越来越满足于表象的呈现,而没有将自身根植于对根本出路的探索之中,未能给出智性的启迪。如若如此,那么负重不堪的底层将去往何处,又何以自救?如此,所谓的底层文学也不过是一种自我消遣的乌托邦式的“暧昧”而已吧。

“暧昧”其三,底层文学并没有获得富有个性意义的创作原则与艺术特质,从而标识出自身与众不同的美学资源。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思想论”与“艺术论”是其一体两面。合理客观地评价某种文学潮流,也必须从美学与历史这两个角度共同切入。就艺术层面来说,底层文学并没有预示着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这与先锋文学、新历史主义等形成了迥异的路径。诚然,底层文学中亦有如《马嘶岭血案》这般独具匠心的作品,但从叙述角度、语言描写、人物刻画、情节塑造等任一方面来看,新世纪底层文学的艺术方法往往都师承自其他的文学类型,并未与其严格区分开来,从而获得底自足的美学建制,这是其形式上“暧昧”的因素。

卡岗曾经引述安布罗斯的观点说:“艺术间的‘边界线’实际上不是线,而是宽窄不等的‘地带’,它们被‘笼罩在神秘的昏暗’中……”事实上,今天的底层文学就处在这样一片“暧昧”的地带,泥沙俱下和边界不清是客观存在的问题。诚然,底层文学的出现与中国社会现实状况的变动紧密相关,自然有其不可磨灭的社会作用。但是,同时我们也需看到“崛起的底层”同样会发出生存的“文化偏至”,从而阻碍文学脱逸进取。基于此,我认为文学界已经到了该对底层文学作一个系统的辨析与反思的时候了,惟有正本溯源,廓清疑虑,才能真正发扬底层所独有的文学精神,激发其自我更生的活力。

□王海晗

底层文学的「暧昧」

第五届郁达夫小说奖终评备选作品诞生

本报讯(记者 丛子钰) 近日,由浙江省作协《江南》杂志主办、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协办的第五届郁达夫小说奖在杭州萧山举行审读委会议。本届审读委由王尧、王春林、任安康、李云雷、李国平、杨庆祥、张学昕、张莉、张燕玲、孟繁华、洪治纲、胡殷红、贺绍俊等13位评论家、作家、编辑家组成。

第五届郁达夫小说奖于今年4月启动作品征集活动,通过六大途径的推荐,征集到大量参评作品。评奖办公室依据评奖条例,从众多参评作品中遴选出了30篇中篇小说和31篇短篇小说,提交审读委成员阅读。

与会专家讨论通过了《第五届郁达夫小说奖终评备选作品投票产生办法》,并肯定了本届候选作品的整体质量。根据投票产生办法,每位审读委须以实名方式推荐中短篇小说各15篇,入围终评备选的作品须获得审读委成员总票数1/2以上(含)的推荐。现场实名投票决选,最终产生中篇小说终评备选作品15篇,短篇小说终评备选作品13篇。在入选名单中,莫言、王安忆、苏童等名家坐镇,一批颇具个人特色的“70后”、“80后”作家杀出重围,而来自台湾、香港的作家白先勇和葛亮同时入围。

郁达夫小说奖自设立以来,始终坚持以弘扬郁达夫文学精神为主旨,强调既关注名家的作品,又重视年轻作家的作品。入围终评的作品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也重视在大时代中发出个人内心呼声。同时,评奖规程和方式坚持“实名投票、评语公开、程序透明、现场揭晓”,充分体现评奖的公开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本届郁达夫小说奖终评备选作品、得票数及审读委评语将在《江南》杂志及相关网站上公布。同时,终评备选作品将提交郁达夫小说奖终评委员会,10月中旬,终评委将针对终评备选作品进行投票决选,最终产生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各1篇,中篇小说提名奖及短篇小说提名奖各3篇。12月7日,郁达夫小说奖将在杭州富阳举行颁奖典礼。

音乐剧《放牛班的春天》将推中文版

本报讯(记者 王觅) 9月7日,由七幕人生出品的法国音乐剧《放牛班的春天》中文版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将于2019年5月正式演出。该剧将延续七幕人生推出的《音乐之声》《灰姑娘》等中文版音乐剧老少咸宜、亲子共享的“合家欢”风格,力求使这一口碑之作通过本土化的改编和演绎,受到更多中国观众熟悉和喜爱。

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自2004年首映以来产生了广泛影响,随后推出的音乐剧版本由电影原班人马打造,备受好评。七幕人生一直致力于海外优秀音乐剧的引进、制作和推广,此次即将

于同名电影首映15周年之际上演的该音乐剧中文版,不仅是该剧首次被翻译成其他语言搬上舞台,也标志着七幕人生的版权引进剧目已由单一的美国百老汇音乐剧拓展至世界范围。

发布会上还举行了该剧“最美男童声”全国海选启动仪式,将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优秀的儿童演员参与剧目演出,北京是此次海选的第一站。七幕人生首席执行官杨嘉敏表示,今后七幕人生还将通过夏令营、冬令营、剧团班等多种形式,努力为中国音乐剧培养和输送优秀小演员,为青少年美育教育作出贡献。

江西举办名家写信丰散文笔会

本报讯 8月31日至9月3日,江西省作协与信丰县县委政府共同在信丰县举办了“走进橙乡 讴歌时代”名家写信丰散文笔会。杨少衡、王雁翎、詹谷丰、李浩、王十月、庞余亮、王国平、郑晓锋、范晓波、陈蔚文、傅非、樊健军、朱强等20余人参加活动。

活动期间,采访团参观了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脐橙产业园、田坎畲族村等地。在中国赣南脐橙产业园,大家深入了解产业园生产运营

音乐剧《TA不见了》传递人生哲思

本报讯(记者 王觅) 由北京全服万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品制作的原创音乐剧《TA不见了》,将于9月28日至10月2日在北京剧空间剧场与观众见面。该剧以“人生中总有一些人或事物会渐渐消失不见”为灵感创作,通过一个新奇而不失悬疑的故事,对人性、成长和改变等话题展开挖掘探讨。

《TA不见了》包括18首原创歌曲,词曲风格将音乐的讲述性和摇滚乐的灵活大胆有机结合,将给人以全新视听感受。全剧打乱正常时空顺序,其构架由现实和过去的片段串联而成,并在不

同人物的回忆中穿梭,由他们记忆里的共性和多样性,引导观众完成主线逻辑的拼图。

据悉,《TA不见了》由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教师刘璐担任导演、编剧、作词、作曲及主演,刘红梅任艺术指导,黄凯任艺术总监,杨映宇任制作人,王越、于佳鑫、于馨儿、熊嘉幸子、肖咏轩等主演。2017年,刘璐创作的首部音乐剧《我已经不再是我》以减压和疗愈的风格感动了不少追梦路上的人。这次推出新作,她希望借此把在每个人身边悄悄流失的爱留下来,让大家都能关注发生在自己身边默默无闻的小美好。

纳雍举行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采访活动

本报讯 8月30日至9月2日,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举办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采访创作活动,王祥夫、冯明德、葛一敏、黄斌、喻子涵、杨敏平、文清丽、邱振刚等30多位作家走进纳雍,对纳雍自然生态景观、社会发展成果、人文精神面貌等领域进行采访。

本次活动以纳雍县同心文化展览馆为首站采访点,作家们在生动详尽的解说中了解纳雍“四乡”(西南煤乡、高原水乡、生态茶乡、苗舞诗乡)的情况。在大坪箐国家级湿地公园、过狮河、纳雍河感受纳雍山水的秀丽,在紫岭千亩茶场体

验煤海和茶乡的魅力,在枪杆岩红色文化区、总溪河流域听苗族飞歌、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纳雍苗族芦笙舞滚山珠、谈彝族文化经典《羊皮火书》,感受纳雍诗乡的内涵。

采访活动后,作家们将记录纳雍的“四乡”发展,推介纳雍特色旅游、生态农业、乡村小镇,让更多人认识纳雍、了解纳雍、走进纳雍,助推纳雍向全面小康社会目标迈进。作家们纷纷表示,要带着这片土地的热度和厚度,带着这片土地的广度和深度,描画出一道别有韵味的、积极向上的新纳雍风景线。(欣 闻)

天津湖社六家巡回展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觅) 9月8日至16日,由三品美术馆和天津湖社画会联合主办的“吾境——天津湖社六家全国巡回展”在三品美术馆北京馆举行。此次展览共展出天津湖社画会的6位艺术家创作的84幅代表作,内容涵盖山水、人物、花鸟等不同题材。

此次参展的艺术家创作风格各具特色。孙长康择山川之高峰雄奇,其画作墨色变化韵趣无穷,技法精到,情感尽致;陈冬至熔诗、书、画为一炉,用笔形美而质朴、气畅而不浮,坚持术有专攻与综合学养并重;关尚卿博观而约取,作品气势恢廓、意境深远,皴擦点染间山水意蕴跃然于图;胡嘉梁杂糅诗词、书法、音乐、戏曲等艺术形式于绘画之中,笔墨苍劲,造形严谨,作品颇具哲理禅思;何延喆作品意构精巧,气象标峻,格调清新,风致清逸,古闲清悠得意笔之功;史振岭以点染之色写意赋彩,画中意象恰神养性游于造物,笔意豪瞻,形神兼备。三品美术馆馆长黄海林表示,此次展览呈现出艺术家们对生活和艺术的感悟,希望观众有所启迪。

据悉,此次巡回展还将于今年10月和12月在三品美术馆贵阳馆和深圳馆展出。

《白鹭归来》展现北京朝阳新风貌

本报讯 在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市朝阳区建区60周年之际,9月11日至13日,由朝阳区文联出品、中影上元国际影视投资有限公司和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联袂打造的原创现代京味话剧《白鹭归来》在北京世纪剧院上演。这部大运河题材的话剧立足于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和“一核一城三带二区”总体规划创作而成,力求展现朝阳区的新时代新风貌。

《白鹭归来》围绕北京市朝阳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萧太后河流域水系改造这一主线,以一个“海归”女学生的视角展开故事,通过反映城市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和对传统文化地标的保护,展现朝阳区的发展变化,以唤起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更好地传承历史文化。据介绍,朝阳区近年来推出了一批深入挖掘大运河文化带内涵的文艺作品,该剧就是朝阳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文学、美术、书法、摄影、音乐、戏剧“六个一”文艺系列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白鹭归来》由孟广禄任艺术顾问,陈兵执导,红孩编剧,赵子铎、张澍、洪岩、李仓卯等主演。全剧创作历时一年多,其间艺术家多次赴大运河沿线采访,邀请专家与创作团队交流研讨,对剧本数易其稿。作为公益性演出,主办方采取预订门票和网上“抢票”的方式提供演出票,受到观众欢迎。(姜 军)